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NATIONAL ACHIEVEMENTS LIBRARY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马克思哲学的历史转向 与西方形而上学的终结

刘福森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NATIONAL ACHIEVEMENTS LIBRARY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马克思哲学的历史转向 与西方形而上学的终结

刘福森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哲学的历史转向与西方形而上学的终结 / 刘福森著.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3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ISBN 978-7-303-22178-3

I. ①马… II. ①刘… III. ①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IV. ①B0-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39559 号

营 销 中 心 电 话 010-58805072 58807651
北师大出版社学术著作与大众读物分社 <http://xueda.bnup.com>

MAKESI ZHUXUE DE LISHIZHUANXIANG YU XIFANG
XINGERSHANGXUE DE ZHONGJIE

出版发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
北京市海淀区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100875

印 刷：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710 mm×1000 mm 1/16
印 张：19.75
插 页：3
字 数：320 千字
版 次：2017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98.00 元

策划编辑：杜松石 责任编辑：韩 拓
美术编辑：王齐云 装帧设计：肖 辉 王齐云
责任校对：陈 民 责任印制：马 洁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010-58805079



作者简介

刻福森 男，河北省玉田县人。1943年8月生。1970年毕业于吉林大学哲学系哲学专业，担任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马克思哲学、生态哲学与发展哲学和哲学观的理论研究工作，在《中国社会科学》(中英文)、《哲学研究》等杂志发表论文百余篇，多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等重要杂志全文转载，出版《社会发展的哲学探索》《西方文明的危机与发展伦理学》等著作。曾担任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理事、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环境哲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出版说明

为充分发挥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和优秀人才的示范带动作用，促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决定自 2010 年始，设立《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每年评审一次。入选成果经过了同行专家严格评审，代表当前相关领域学术研究的前沿水平，体现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的学术创造力，按照“统一标识、统一封面、统一版式、统一标准”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2011 年 3 月

前 言

本书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2008 年度重大研究项目“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性质研究”的最终成果，现在以《马克思哲学的历史转向与西方形而上学的终结》为名出版。本书的主题是对“马克思哲学的总体性质”的新探讨。我的观点是“马克思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

—

本书之所以把这个看似“老掉牙”的问题作为选题进行研究，不仅是因为这个问题对于马克思哲学的研究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还因为，我国学术界至今没有对这个问题给予令人信服的回答。学者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不仅存在着不同的理解，而且存在着尖锐的理论观点的对立。例如，现在仍然有很多人把“物质决定意识”的“物质本体论”的旧唯物主义命题看作具有普适性质的“一般唯物主义”命题，把“物质决定性”看作各种不同形态的唯物主义(其中包括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的共同本质，进而把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世界观也看成一种物质本体论，而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仅仅看作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也有人仍然坚持西方传统哲学的抽象的人本主义、人道主义观点，并从抽象的人出发，把抽象的“人的本质”作为理解和评价人、社会以及共产主义的基本理论原则，把“人性异化”的理论看作马克思哲学的核心和灵魂。还有很多学者仍然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看作“全部哲学”的基本问题，即看作包括西方现代哲学和马克思哲学的基本问题。这样，就只能

把马克思哲学理解为解决“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的”唯物主义，这样的唯物主义只能是“物质本体论”的旧唯物主义，而不可能是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因此，虽然现在也有一些人表面上承认了“马克思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论断，但是，承认这一论断是一回事，而是否真正坚持这一论断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当人们在上述问题上仍然用旧哲学的理论原则去理解马克思时，（例如，当人们仍然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看作马克思哲学的基本问题）实际上仍然没有摆脱西方传统哲学的形而上学，因而实质上否定了“马克思哲学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论断。

我在 1991 年发表的几篇文章中，提出“马克思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当时，在马克思哲学的研究中，学术界的主流观点是“实践哲学”，其中包括“实践的观点”“实践唯物主义”“实践思维方式”“实践本体论”“实践人本主义”等流派。这些派别是在反思和批判我国传统的哲学教科书的基础上形成的，其内容是集中批判“物质本体论”观点，用实践哲学取而代之。实践哲学对传统教科书的物质本体论来说，无疑是一个理论的进步，然而它仍然存在着致命的理论缺陷。坚持实践哲学的学者，大部分都是立足于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特别是《提纲》的第一条），其主要目的是用“感性活动”的思想取代费尔巴哈的“感性存在”的思想。这样理解的人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坚持“实践哲学”的绝大多数人仍然坚持“世界观”与“历史观”的二元区分，把实践概念看作马克思哲学的世界观的概念，而把历史主义看作历史观的概念。虽然人们也承认实践是社会历史的实践，然而，无论是在理论内容方面，还是在思维逻辑方面都不能把马克思哲学的“历史的观念”纳入对实践观念的解释之中，因而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下面的理论缺陷：第一，当人们把实践概念看作高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概念，而把历史唯物主义看作仅仅是历史观的时候，人们在哲学观问题上所坚持的仍然是从抽象实践（世界观）推导出历史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思想路线，仍然是把历史唯物主义看作“一般世界观”的下属部门和具体应用。第二，在实践哲学中，很多研究者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回避了对“唯物主义”的确认。虽然也有学者把马克思哲学称作“实践的”“唯物主义”，但是，如果离开“历史的原则”，仅仅强调实践的抽象的能动

性原则，还无法解释实践哲学自身“何以能够成为唯物主义”的问题。实践是在人的主观目的支配下的能动的主体性活动，因而是一个包含着意识能动性的主体性概念，离开历史的解释原则，就无法证明实践活动的客观性，因而也就无法证明实践哲学的唯物主义性质。第三，实践哲学虽然强调了人的活动的能动性，并以此同费尔巴哈的旧唯物主义相区别，但是却忘记了，费尔巴哈不仅不理解人的活动的能动性，而且也不理解人的活动的社会历史性；而如果不理解实践活动的历史性，就无法证明实践活动的客观性。因此，仅仅强调实践的能动性原则，还不能把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同费尔巴哈的旧唯物主义完全区别开来，因而不能发现费尔巴哈哲学的历史唯心主义性质，不能用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去批判费尔巴哈的唯心主义（参见本书第九章第四节）。实践哲学没有把自己推进到历史唯物主义，就使得它讲的实践概念或者是指抽象的人类共同性（人的一般本质），或者是指孤立的人类个体的生命活动，因而实践哲学在本质上仍然是以人的抽象的“类特性”为基本原则的。尽管实践哲学口头上并没有否定实践的社会历史性，但是，当它把实践哲学看成高居于历史唯物主义之上的一般哲学世界观，而把历史唯物主义看作仅仅是一种下属于它的历史观的时候，就必然使得这种实践观失去“历史的解释原则”的支撑而重新陷入旧的形而上学人本主义哲学。

马克思哲学的总体性质问题，是马克思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性问题。这是因为，能否准确地对这个问题作出回答，不仅直接影响着我们对马克思哲学中的各个具体问题的研究，而且直接影响到我们对马克思哲学的应用性研究：如果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和对立，那么，我们对马克思哲学的局部问题的研究和应用性研究也必然陷入一种无所适从的境地；如果我们在这个问题的理解上是错误的，那么，我们对马克思哲学的具体问题的研究和应用性研究，也会出现方向性错误。因此，本书的重点就是期望对马克思哲学的总体性质问题做出新的解释。为此，我们通过对哲学观的重新理解和解释，并通过对马克思的经典著作文本的分析，对那些明显违背马克思本意的观点有针对性地做出切合实际的分析与评论。

二

当人们对某些问题的研究长期争论而不能统一时，我们的研究就不能仍然停留在这些争论本身，而去寻找引发理论分歧的更根本的原因。仅仅停留在同一个理论层面上讨论问题的方法是一种“平面式”的讨论方法。这种“平面式”的讨论方法，往往使讨论的双方陷入僵局，各说各话，最后只能不了了之。我国关于马克思哲学的总体性质的争论的结局，就是这样一种结局。对于中国学术界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论，我们采取一种“立体式”的研究方法，即从问题本身的研究出发，深入到引起这些争论的更深层的理论层面的研究。只有解决了这些更深层的理论问题，表层的争论才能迎刃而解。实际上，在关于马克思哲学的总体性质的研究中发生的分歧，在很大程度上是与人们对哲学观的不同理解直接相关的：一个人，有什么样的哲学观，就会有什么样的哲学。因此，要研究马克思哲学的“世界观”，首先就应该弄清马克思的“哲学观”，因为一个哲学家的哲学，总是与他的哲学观相适应的：如果我用西方传统哲学形而上学的哲学观去解释马克思哲学，就必然会把马克思哲学解释为西方传统形而上学，因而必然会曲解马克思哲学的理论性质。因此，本书在对马克思哲学的总体性质进行论述之前，我们首先对马克思的哲学观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探讨。这种从“深层”的理论研究去解决“表层”理论问题的研究方法我们把它叫作“立体式”的研究方法。在过去几十年对马克思哲学的总体性质问题的研究中，我国学术界始终没有进入对马克思的哲学观研究，即没有从哲学观的层面去解决马克思哲学的总体性质问题，因而使得对马克思哲学总体性质的研究始终处于各说各话、争论不休的境地。

从全书的结构来看，本书的第三编是重点。全书的主要目的就是论证“马克思哲学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然而，要对这个问题做出令人信服的论证，首先要对马克思的经典文献做出符合马克思本意的理解和解释。因此，我们把对马克思哲学创立时期的经典文献的分析放在了对马克思哲学总体性质论述的前面（第二编）。其次学术界之所以对马克思哲学存在着巨大的分歧而得不

到解决，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即在哲学观问题上存在的分歧。由于人们在哲学观问题上的分歧没有得到解决，人们对马克思哲学的总体性质问题的分歧也不会得到根本的解决。因此，我们不仅在哲学观的层面上对我们的观点进行了论证，而且把对哲学观的阐述放在了本书的最前面(第一编)。

本书的第一编是对哲学观的探讨。这部分内容主要是批判西方传统哲学的旧哲学观，我把这种哲学观叫作“形而上学的本质主义的哲学观”。在这个宗旨下，本书在批判旧哲学观的同时，进一步阐述了“新哲学观”所理解的哲学的基本特征以及我们对待哲学的应有态度。本书提出，“哲学是什么”的问题是哲学观的首要问题。然而，哲学家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却不能告诉我们关于“哲学是什么”的知识——因为根本就没有一个统率全部哲学的“一般哲学”的存在。因此，哲学家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只是表明了“这个哲学家”对待哲学的一种主观态度(他喜欢或反对哪种哲学)而已。哲学家们在对“哲学是什么”问题的回答中，实际上是把自己喜欢的那种“特殊哲学”说成是理想的“一般哲学”了。(参见本书第二章第一节)。因此，哲学史上的哲学家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也是各不相同的：一个哲学家有什么样的哲学，就有什么样的哲学观。哲学家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并没有告诉我们“一般哲学”是什么的“知识”，而只是表明这个哲学家对“哲学是什么”的一种主观选择，一种理论态度而已。海德格尔也持同样的观点：我们“无法想当然地一般地确定哲学的任务是什么以及该从哲学要求什么。哲学发展的每一个阶段，每一个开端都有自己的法则。人可以说的，只有哲学不是什么，哲学不能是什么。”^①

形而上学的本质主义的哲学观，首先给哲学设定一个抽象的“一般本质”，并把这个“一般本质”实体化为一个“一般哲学”的存在，进一步又以这个“一般哲学”为“思想坐标”，去解释哲学史上的各种现实存在的特殊哲学，其中也包括马克思哲学。这样做的结果，就把现实存在的特殊哲学都归结为这个“一般本质”的特殊表现形式。例如，人们假设在各种特殊的唯物主义之中有一个普遍适于各种唯物主义的“一般本质”，即“物质决定意识”的“物质本体论”。而

^① [德] 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商务印书馆 1996 年版，第 10 页。

实际上，这种物质本体论仅仅是 17—18 世纪的那种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人们是把这种特殊形式的唯物主义当成了一种普适于各种唯物主义的“一般唯物主义”，这样也就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看作这种物质本体论的一种特殊的存在方式，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最后就被归结为这种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了。现在很多人在解释实践的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时，最终都要到物质本体论中去寻找答案，都是用“物质（自然）决定性”去解释实践的客观性、解释人的历史活动的客观性，这实际上是把实践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都还原为 17—18 世纪的旧唯物主义了。这种哲学观同黑格尔的那种把哲学史看作“绝对理念的自我意识”的本质主义哲学观在思维方式上没有实质上的区别。本编主要批判了这种形而上学的本质主义的哲学观，阐释了哲学的基本特征以及我们对待哲学的应有态度，并在此基础上对马克思的新哲学观做出新的理论概括，我把它叫作“历史的唯物主义的哲学观”。这种“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观”正是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深层的基础。

本书的第二编是对马克思哲学形成时期的三篇经典文献——《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以下简称《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的重新评价。要做到正确理解马克思哲学的理论特质，把马克思哲学同其他非马克思哲学区别开来，就必须对马克思哲学形成时期的有代表性的经典文献重新研究和评价，区分开在马克思哲学自身形成过程中哪些文献是不成熟的，哪些文献是处于变化过程中的“萌芽”性的，哪些是完全成熟的。如果不区分开马克思的成熟的与不成熟的思想，就会把马克思成熟前的思想都看成马克思的成熟思想，使得我们无法把马克思的新哲学同旧哲学区别开来，因而也无法认清马克思哲学的理论特质。为此，本书选择了马克思哲学形成时期的《手稿》《提纲》和《形态》三部文献做重点研究，它构成了本书第二编的内容。

本书第三编主要是阐述马克思哲学的理论特质。这个问题，也是全书的核心问题。所谓哲学的“理论特质”，是指某一个哲学家的哲学同其他哲学家的哲学相区别的特殊性质。因此，一个哲学家的哲学思想的理论特质，既代表着一个哲学家思想的独特性，即个性，也代表着这个哲学家思想的创造性

价值。这里之所以要提出马克思哲学的“理论特质”问题，是因为在我们对马克思哲学的研究过程中一直存在着忽视马克思哲学的独特性价值的理论误区：人们为了强调马克思哲学同以往旧哲学的理论关联，往往把旧哲学的东西直接拿来当作马克思的新哲学的组成部分。例如，当人们把黑格尔的辩证法作为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理论前提的时候，却把黑格尔的辩证法拿来直接当做了马克思的辩证法，没有看到马克思的新辩证法与黑格尔的旧辩证法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辩证法：黑格尔的辩证法是构造他的形而上学体系的工具，是形而上学的“婢女”，在本质上仍然是形而上学的，而马克思的辩证法却是在根本上对形而上学的颠覆和否定。因此，只有把辩证法从黑格尔的形而上学的牢狱中解救出来，才能成为马克思哲学的辩证法。这个“解救”过程不是简单地承认了物质决定性，又承认意识对物质的反作用就达到了“唯物主义的辩证法”了。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辩证法的独特性被忽视了，人们谈论的马克思的辩证法，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仍然没有超出黑格尔的辩证法。正是这些理论误区，影响了我们对马克思哲学独特性质的正确理解。

在对马克思的哲学观重新理解和对经典文献的重新评价的基础上，本编探讨了马克思的新世界观——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同历史观、历史科学的关系，探讨了实践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探讨了马克思的新世界观同西方传统哲学的人本主义、人道主义的关系，探讨了马克思的辩证法的理论特质以及马克思的辩证法同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探讨了马克思的伦理思想的理论特质以及马克思的伦理思想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关系，阐明了马克思哲学的创立是一场深刻的哲学革命。

三

作为《前言》的主要任务，我们在这里主要介绍一下本书的主要观点和理论创新。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哲学世界观，是一个严密的思想体系，因此，如果我们将其中的某一个个别思想做出了新的理解和解释，那么，我们对与此相关的其他个别思想也必须做出同样的新的理解和解释。因此，我们对马

克思哲学总体性质问题的解释的创新不是仅限于对个别的观点的理解和解释上。由于我们的理解同现在很多人的理解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因而需要在《前言》中做一个简要的说明。

1. 马克思的哲学观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观

在哲学观的问题上，我们的理论创新突出表现在，我们提出了马克思的哲学观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观，并对现在仍然十分盛行的形而上学的本质主义的哲学观进行了反思和批判。关于马克思的哲学观问题，国内外学者没人专门提出和系统研究过，因而这个问题在我国学术界一直是模糊的：当我们谈到马克思的哲学时，似乎没有人反对马克思哲学同西方传统哲学有区别，但是，讲到哲学观时，却很少有人明确地把马克思的哲学观同西方传统哲学的哲学观区别开来。在一些人的头脑中，似乎马克思没有自己的新哲学观，似乎西方传统哲学的哲学观也就是马克思的哲学观，因而很少有人专门把马克思的哲学观问题当作一个问题进行专门的探讨；对于马克思哲学的研究，人们一直把西方传统哲学的哲学观看作一个具有普适性质的哲学观，因而也把它看成马克思的哲学观，并把这个哲学观看作阐释马克思哲学的基础，在这个旧哲学观的前提下理解马克思哲学，这就必然把马克思哲学还原为旧哲学。本书对马克思的哲学观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提出了“马克思的哲学观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观”的观点。我们认为，马克思不仅在哲学“世界观”上超越了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也在“哲学观”上超越了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的本质主义的哲学观，构建了一种历史的、唯物主义的哲学观。我认为马克思的新哲学观应该包括以下内容。

第一，马克思确立了新哲学观的逻辑出发点。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的本质主义的哲学观是用哲学的“一般本质”或“一般哲学”去解释现实存在的特殊哲学。黑格尔说：“在理念中出现的一切的部分和所有这些部分的系统结合，均由此唯一理念产生”，“作为全体中的部分，个人就像瞎子一样，他乃是各全体的内在精神驱使着前进的”。黑格尔哲学的逻辑出发点，是用绝对理念解释现实存在的特殊哲学的唯心主义思想路线，而马克思的新哲学观则是从现实的社会历史条件出发去解释现实存在的、有个性的特殊哲学的。在马克

思看来，所谓“一般哲学”只不过是哲学家们的幻想，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有个性的特殊哲学才是“现实的哲学”；现实的社会历史条件才是“现实哲学”的存在所依赖的必要条件。这样，马克思就在哲学观上颠覆了形而上学，确立了一个与传统旧哲学观完全不同的“观哲学”的逻辑出发点和思想路线。形而上学的本质主义的哲学观的思想路线是用超时间、超历史的“一般哲学”去解释、要求和评价现实存在的哲学，这实际上就是“用观念去解释现实”的唯心主义的思想路线，而马克思的哲学观则是用现实的历史条件去解释现实的哲学的思想路线，这才是在哲学观问题上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路线。

第二，马克思的哲学观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观。马克思的新哲学观是唯物主义的哲学观，但不是坚持“物质决定意识”的旧唯物主义的哲学观，而是坚持“生活决定意识”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观。哲学家之所以能够成为时代的精神代表，不是因为他的哲学超越了同现实的生活世界的联系而成为具有普适性质的“一般哲学”，而是因为他以他的哲学理解反映了特定时代的人类的生存主题。一种哲学的生成，不是来源于“绝对理念”在哲学史舞台上的自我表演，也不是来源于原有的旧哲学自身的“自我繁殖”，哲学的“根”在现实的生活世界。哲学不是仅仅供人进行欣赏的精神财宝，也不是供社会闲人们打发时间的思维游戏；为时代和民族提供核心的价值观是哲学家不可逃避的社会责任。哲学只有与隐藏在历史深处的人的现实的生存需求联系起来，才是有价值的精神财富。（本书第一章第三节）

第三，所谓“哲学终结论”实际上是“形而上学终结论”。“哲学就是形而上学”是西方传统哲学家们在哲学观上的一个核心判断。这个判断宣示了马克思哲学、西方现代、后现代哲学已经不再是哲学——“哲学已经终结”。这种“哲学终结论”把不是形而上学的哲学完全排除在哲学之外，而仅仅把西方传统哲学看作哲学。因此，所谓“哲学终结论”所要“终结”的，不是“全部哲学”，它要终结的仅仅是“作为形而上学”的西方传统哲学。恩格斯说“哲学在黑格尔那里完成了”，“以往那种意义上的全部哲学也就完结了”。恩格斯所说的“全部哲学”，就仅仅是“以往那种意义上的全部哲学”，即作为形而上学的那种哲学。人们说的“后哲学”时代，实际上说的仅仅是“后形而上学”时代。现在，

还有很多人把“哲学就是形而上学”这个西方传统哲学的哲学观当作马克思哲学的哲学观，并用这种哲学观去评价马克思哲学。从这种哲学观出发，怎么看马克思哲学也不像“哲学”（实际上是不像旧哲学，即不像形而上学），于是，有些人把马克思哲学看成哲学的“另类”，看作一种不好的哲学；另一些人则按照“哲学就是形而上学”这个旧哲学观的标准，对马克思哲学进行“改建”和“装修”，把马克思的“还未脱离或还未完全脱离旧哲学形而上学”的不成熟的思想看作真正的马克思哲学思想（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思想），用形而上学的人本主义、人道主义取代马克思哲学的历史唯物主义，而把马克思的成熟思想——历史唯物主义仅仅看作一种唯物主义的历史观，经过这样的“改建”和“装修”之后，马克思哲学就真的很“像哲学”（实际上是很像旧哲学）了。这种现象的发生，同人们对哲学观的错误理解直接相关：我们不能以西方传统哲学的旧哲学观为标准去解释和要求马克思哲学，而应该按照马克思的新哲学观去解释和评价马克思哲学；如果我们站在旧哲学观的立场上去要求马克思哲学必须符合旧哲学的话，那么，马克思哲学当然就成了不规范的“另类”哲学了，一些人用形而上学本体论、抽象的人本主义和人道主义去“改建”马克思哲学的做法，其主观目的还是好的，是为了使马克思哲学更像“哲学”，只不过是由于错误地理解了哲学观而导致对马克思哲学的错误理解而已。

第四，“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不是马克思哲学的基本问题。我们认为，这个论断，应该成为马克思新哲学观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原则。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说成是全部哲学的基本问题，来源于恩格斯的一段话：“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但是，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全部哲学”，是指“以往那种意义上的全部哲学”，即西方传统哲学（形而上学哲学），而不包括马克思哲学以及现代、后现代哲学。恩格斯指出，“哲学在黑格尔那里完成了”，“以往那种意义上的全部哲学也就完结了”。这里的“哲学”显然是指“形而上学”，即西方传统哲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说，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这已经根本不再是哲学，而只是世界观”。这里的“哲学”，显然也是指“形而上学”——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不

再是哲学”，是指不再是“形而上学”。可见，按照恩格斯的说法，马克思哲学当然是不包括在这个“全部哲学”(形而上学)之中的。因此，马克思哲学的基本问题，也就不再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形而上学的基本问题。马克思把自己的新哲学的基本问题归结为“生活与意识的关系问题”。“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的命题就是马克思对由他创立的新哲学的基本问题所做的唯物主义的回答。“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形而上学哲学的基本问题，西方传统哲学的“旧唯物主义”与“旧唯心主义”的划分，就是由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做出的，而马克思哲学研究中的“现代唯物主义”与“现代唯心主义”的划分，则不是由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做出的。如果认为“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仍然是马克思哲学的基本问题，就必然把马克思哲学仍然归结为形而上学，也必然把物质决定论的旧唯物主义看成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参见本书第九章第三节)

第五，哲学的评价问题。人们在谈到哲学的评价问题时，只注意到哲学作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式同其他意识形式的区别，特别强调了哲学意识形式同科学意识形式的区别，强调不能用评价科学的方式去评价哲学的“有用性”。但是，这种观点仅仅注意到了哲学与科学这两种意识形式之间的区别，而没有注意到在哲学意识形式内部，不同时代的哲学在“内容上”也是各不相同的。形而上学的本质主义的哲学观讲的哲学，始终是作为“一般意识形式”的“一般哲学”，它所谈论的对哲学的评价，也仅仅是对抽象的“一般哲学意识形式”的评价，它从来没有关注到对不同时代的特殊哲学(现实的哲学)的评价问题。我们突破了这种传统的本质主义哲学观的理解，把哲学和时代性联系起来，认为“现实的哲学”都是在特定历史时代产生并为特定的历史时代服务的哲学。哲学的用途，是要为时代提出的人类生存问题做出哲学回答。因此，我们谈的哲学的评价，主要是在哲学与时代的关系中，把特定时代人的生存价值作为评价现实哲学的尺度。我们不能简单地谈论“一般哲学”的有用与无用的问题，而应该对“现实存在的(特殊)哲学”做出评价。按照哲学的时代本性，任何现实存在的哲学都是它所在的特定时代的“时代精神的精华”，任何哲学都不可能超越它的时代，因此，只有那些符合自己时代的需要的哲学才是有用

的哲学，相反，那些落后于时代的哲学，由于它本身是以往的历史时代的产物，由于它仅仅是属于以往的历史时代的，因而对于当代来说，它所提供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则不仅是无用的，而且可能是有害的。这种依据时代性所做的评价，才是一种历史唯物主义的评价。（参见本书第二章第二节）

第六，哲学的功能。解释世界还是改造世界？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存在论（本体论）哲学的功能就是“解释世界”。它们无论是追问世界的本原是什么，还是追问世界的本质是什么，都是为了在变化的世界中，寻找一种现成的、关于世界永恒不变的“终极解释”的知识，这就是为世界的“不可改变性”寻找哲学根据。这样的哲学只能是解释世界的哲学，不可能成为“改变世界”的哲学。马克思超越了传统的形而上学存在论，改变了对待现存世界的绝对肯定的态度，追求一个可能的、未然的世界。这样，马克思就实现了一场“反传统”的哲学观革命，从仅仅解释世界的形而上学本体论哲学的哲学观，走向了一种以改变世界为宗旨的实践论哲学的哲学观，实现了理论思维与革命精神的融合。真实的马克思有两种身份：一是哲学家，二是革命家。马克思是身兼这两种素质和身份的特殊的人——作为革命家的哲学家或作为哲学家的革命家。他既不像单纯的实践家那样缺乏哲学的修养与思考，也不像单纯的哲学家那样缺乏革命的激情和对现存世界的反抗精神。马克思把他的革命激情嵌入他的哲学思考之中，就形成了他的以改变世界为基本特征的新哲学和新哲学观。

2. 重新评价马克思哲学形成时期的三篇经典文献

在对马克思哲学形成时期的三部经典文献的研究中，我们对马克思的三部经典文献的“成熟性”问题做出了明确区分：马克思的《手稿》是一篇“完全没有成熟”的著作，马克思的《提纲》是一篇“没有完全成熟”的著作，而《形态》则是一部“完全成熟的”的著作，它是第一部系统阐述了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世界观的著作。在我国的马克思哲学的研究中，很多人对这三部文献的成熟与否不加区分，甚至在一篇文章中同时引用这三篇文献；也有人把《手稿》和《提纲》看作马克思的哲学著作，而把《形态》仅仅看作一部关于历史观的著作，在讲马克思的哲学世界观时引用《手稿》和《提纲》，而在讲马克思的历史观时才